

勵耘學刊

总第十四辑 二〇一一年

學苑出版社

1523874

勵耘學刊

(文学卷)

2011年第2辑
(总第14辑)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主办



淮明师院图书馆 1523874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励耘学刊. 第 14 辑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77-3908-4

I. ①励…Ⅱ. ①北…Ⅲ. ①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②汉语—
语言学—丛刊Ⅳ. ①I206-55 ②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1339 号

ISBN 978-7-5077-3908-4



9 787507 739084 >

出版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37.5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字 数: 598 千字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0 元 (文学卷、语言卷两卷合订本)

《励耘学刊》（文学卷）编委会

顾问 童庆炳

主编 郭英德

副主编 李春青 李 山 杨联芬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翠玲 万建中 王向远 方 宁

乐黛云 过常宝 刘 利 刘晓南

孙银新 李 山 李正荣 李宇明

李运富 李国英 李 怡 李春青

李 强 杨 义 杨联芬 吴福祥

张 健 张涌泉 张清华 陈思和

郑国民 项 楚 赵 勇 姚建彬

郭英德 黄开发 曹卫东 盛 宁

董晓萍 蒋原伦 蒋冀骋 温儒敏

冯胜利 (美国) 大西克也 (日本)

徐富昌 (中国台湾) 黄坤尧 (中国香港)

李欧梵 (中国香港)

编 务 许庆江

目 录

励耘论坛

中国文学之道的美学解说

——讲授“《文心雕龙》研究”十周年 童庆炳 (1)

新视域

孔子像不像“丧家狗” 周兆新 (28)

对所谓“汉学主义”的思考 张西平 (34)

跨国文学的接受——以哈金的《打虎英雄何处觅》为例·· 葛良彦 (48)

文学史专题

二南、楚歌、乐府——楚地南音探微 苏慧霜 (58)

《诅楚文》文体辨析 董芬芬 (81)

张爱玲的金锁: golden cangue 抑或 golden lock ? 杨俊杰 (91)

文化研究

试论保员簪铭文所见礼典 贾海生 (103)

力本体论哲学和美学的构建

——林同济的世界视野与中国经验 张武军 高阿蕊 (109)

作为虚无主义者的屈原 敬文东 (124)

海外汉学

- 英语世界中《金瓶梅》的研究与翻译…………… 黄卫总 (167)
- 述论郭沫若诗歌之英文翻译…………… 北 塔 (176)
-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藤田梨那 (189)
- 现代主义宇宙学：英语诗歌中的汉语关联诗学…………… 石江山 (204)

文献考辨

- 章樵生平著述考…………… 王晓鹃 (220)
- 20 世纪吕洞宾研究综述 …………… [韩] 张贤珠 (230)
- 北京师范大学世界文学学科史略 (1949—1966) …… 刘洪涛 张 珂 (239)

青年园地

- 世衰法盛——天然函星广聚三千徒众之时节因缘…………… 李宛玲 (251)

文史名家

- 学蔚醇儒姿 文包旧史善——聂石樵教授访谈录…………… 过常宝 (269)

征稿启事

中国文学之道的美学解说

——讲授“《文心雕龙》研究”十周年

◇童庆炳^①

一、讲授“《文心雕龙》研究”缘起

1994年秋天，在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给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开设了一门新课——《文心雕龙》研究。其后，我每年都给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讲一遍。1996年去韩国高丽大学任教，耽误了一次，但在1997年补上了。2000年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搞研究，又耽误了一次，但也在2001年又补上了。2003年我给学生讲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停了一年。从1994年起至2005年共11年，恰好给我校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讲授了十遍《文心雕龙》。

我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程呢？这与我对于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思想有关。我总觉得，对于研究生来说，自己读书、研究是最重要的。如果自己不能主动地精心地读书和研究，还要老师一口一口地喂，那么最终不能形成独立的研究能力，撰写论文也就成为问题。此前，我曾先后指导过研究生精读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斯托洛维奇的《审美价值的本质》、杜·舒尔茨的《现代心理学史》。我把这种指导，开成了课程。每次指定学生读其中的一章，并请他们细细地讲解，然后是师生间的热烈讨论。其结果是对于所读的书做到了真正的理解和消化。我记得1984年我指导我的第一届硕士生读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之后，学生们引得最多的就是苏珊·朗格著作中的话，似乎苏珊·朗格的每一个句子都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血肉。这正是我希望获得的效果。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有了精读一部著作的经验后，他们接下去就知道如何把其他著作读精读透

^① 童庆炳（1936—），男，福建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古代文论、文化诗学等。

了，然后他们就会顺利地开始自己的研究生涯。

在1994年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教学与研究，1990年后，我的研究有了一次转变。我开始对中国古代文论发生了兴趣，开始撰写关于古代文论的短文。我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这个新天地如此靓丽，如此精彩，充满了诗情画意。这和此前所读黑格尔是完全不同的。黑格尔给我们的是概念和逻辑，枯燥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但中国古代文论给我们的常常是点到即止的评点。短短的评点中往往包含了真知灼见和诗情画意。我沉浸在这个新的天地中。我想把我的发现让学生与我共享。于是我决定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课。我自己读，学生也来读，在课堂上把阅读的体会通过对话进行交流。但问题不是你想开设《文心雕龙》课就能开设的。如果你连古文都读不懂，你如何去开设这门课程呢？幸亏我有这方面的起码准备。1963—1965年期间，我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开设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并注释过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1967—1970年间，我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教书，教学之余，又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中国古籍。所以1990年后，我觉得有信心去打开中华古代文论这座宝库。《文心雕龙》被我看成是打开这座宝库的一个关键。

我的《文心雕龙》研究的教学可以说是最朴素的。我往往是自己先讲开始的三四篇，如《序志》、《原道》、《辩骚》、《明诗》等篇，我先逐字逐句地串讲，然后把自己研究这篇的心得拿出来和同学们一起交流，我先说，大家讨论。发扬教学民主，有不同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那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就能形成热烈的讨论局面。我讲完若干篇后，就让每位学生讲一篇，讲的方法与我讲的方法相同。不过由于大家都要系统地讲其中的一篇，不得不认真地准备。这准备的过程让同学们受益匪浅。因为不但要弄懂那些难懂的句子，还必须阅读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找出其中的问题，深入钻研进去，获取自己的研究心得。在课堂上，由于被讨论的是同学们自己的心得，大家就敢提问或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时候课堂上的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你想控制都不容易控制。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自己也常常从同学们的讨论中受益。我想这就是教学相长了。最后我的学术总结，有时是重要的，有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大家都讨论到了。

重要的是考试。考试要求每个学生撰写一篇5千到1万字的关于《文心雕龙》的论文。同学们做得很认真。每篇作业就是一篇完整的论

文,差不多都达到了发表的水平。事实上,多数作业成为这位同学的论文处女作,并在某个刊物发表出来,成为“龙学”的新的篇章。

我的《文心雕龙》研究课还在进行中,今年秋天我将给新来的博士生讲第十一遍。

随着教学的进展,我的《文心雕龙》研究也获得进展,尽管进展很慢。十余年来我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江海学刊》、《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先后发表了二十一篇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文心雕龙〉“心物宛转”说》(1993年)、《〈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1999)、《〈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1998)、《〈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1999)、《〈文心雕龙〉“神与物游”说》(1999)、《〈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1999)、《〈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1999)、《〈文心雕龙〉“内内符外”说》(2001)、《〈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2004)、《〈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2005)、《〈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2006)、《〈文心雕龙〉“杂而不越”说》(2006)、《〈文心雕龙〉“文外重旨”说》(2007)、《〈文心雕龙〉“丽辞雅义”说》(2007)、《〈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2008)、《〈文心雕龙〉“质文代变”说》(2008)、《〈文心雕龙〉“披文入情”说》(2009)、《〈文心雕龙〉“铄意裁辞”说》(2010)、《〈文心雕龙〉“声得盐梅”说》(2011)、《〈文心雕龙〉“章明句局”说》(2011)、《〈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011)。还有数篇论文等待进一步加工。我的《文心雕龙》研究受到了“龙学”界的关注。由张少康教授等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一书中说:“童庆炳近年来,发表了多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其中如《〈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一文,是作者对《辩骚》篇的研究,认为该篇的理论意义在于刘勰在肯定楚辞推进了文学新变的前提下,借用兵家的‘奇正’观念具体论述了文学创作变化中的艺术控制和调节问题。‘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堕其实’,是《辩骚》篇的点睛之笔,准确地揭示了楚辞的特色,要求创作在奇与正、华与实之间保持平衡,取得一个理想的折衷点,使作品产生一种微妙的艺术张力。”^[1](p464)]我的理想是完成一部题为《〈文心雕龙〉三十说》的著作,作为我教学《文心雕龙》的学术总结。

二 我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解

(一) 刘勰其人

根据《梁书》列传记载：刘勰，字彦和，祖籍山东东莞人，今山东莒县。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其祖在永嘉之乱时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其父曾官至“越骑校尉”（统率骑兵的武官），但过早去世。刘勰很小就成为孤儿。20岁左右其母也去世。家境更为凄凉，“家贫不婚娶”。但刘勰从小就很好学，他曾跟随当时定林寺的僧祐学习并编订佛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遂博通经纶”，当时定林寺的经藏，是刘勰编订的。刘勰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他33—34岁时撰写了长篇论文《文心雕龙》（约4万字）。但他的这部著作，虽然在古典与新声间徘徊，但从《原道》、《宗经》、《征圣》诸篇看，还是偏重于遵从儒家经典，讲究“述志为本”，对当时流行文学追求形式完美的倾向有所批评，所以不能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未为时流所称”。但刘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2] (p495)}。这段文字为唐人姚思廉所写，似有些疑问。沈约在梁代官至尚书令，领太子少傅，而且是当时文坛领袖，其文学主张与刘勰不同，大力提倡骈体文，讲究“四声八病”和用典等，是当时文学新声的代表人物，怎么会觉得较为守旧的《文心雕龙》“深得文理”呢？而且把《文心雕龙》“陈诸几案”，随时翻看。难道他就看不出刘勰的著作对于他喜爱的时文的文风过分形式化表达不满吗？当然，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沈约根本没有看，所谓“深得文理”的说法是写《梁史》的姚思廉杜撰的；第二种可能是沈约看了，沈约本人在主张文风变革的同时也仍然信奉儒家思想，所以对于刘勰这部“务为折中”的书，在古典与新声间徘徊的书，也就有同感，并加以肯定；第三种可能是沈约看了，他对于这部用漂亮的骈体文写的著作，从他的重形式美的探索的观点出发，加以赞赏。刘勰的《文心雕龙》五十篇的确是骈体文的典范，有些篇如《神思》、《物色》，写得跟诗一样美。刘勰写骈体文章在当时就很出名。列传中说：“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在这三种可能中，我是比较赞成第二种可能的。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与他的人生观有关。他承继了古人的“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他想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要“立功”，驰骋战场，统一天下，是他做不到的；立德，这虽然很重要，也能做到，但他觉得自己人小言微，影响有限，于是他想到“立言”这一条路。他在《序志》篇说得很清楚：“余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常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他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在七岁时，梦见彩云像锦绣一般，便攀上去采它。等我过了三十岁，则曾梦见拿着朱红漆的礼器，随同孔子南行。早上醒来，高兴极了。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竟然在我这样普通人的梦里出现了。自有人类以来，还未有孔夫子这样的人。敷陈赞述圣人的微言大义，最好是注释经书，可马融、郑玄等人，已阐述得很精到，我即或有深解，也不能自立一家了。马融注《小经》、《尚书》、《诗经》、《易经》等。郑玄是马融的弟子，注有《论语》、《孝经》、《尚书》、《三礼》、《毛诗笺》。只有文章的作用，可以成为经典的旁支；五礼靠它来完成，六典靠它来施行，君臣的政绩能宣扬出来，军国大事能昭示天下，与文章有关，但是文章的本源还在经典上面。这也就是说，刘勰决心走立言这条路，写出能够传世的文章来，这样他就可以“不朽”了。

梁代天监初年（公元502或503年），刘勰“起家奉朝请”，开始做官，最初是没有实缺的官，其后，也做过一些有实缺的小官，如他曾做过浙江衢县县令。最有意义的事他曾当过昭明太子“东宫通事舍人”（管理太子文书的官职）。昭明太子萧统曾编过《文选》，喜爱文学，对精通文学的刘勰也自然格外喜欢。刘勰经常能和昭明太子谈诗论文，这可能是他生活最为愉快的几年。他为官如何，已不可考。列传中只提到一件事，他曾建议在祭天地时，不用猪羊，只用蔬菜，他的建议被采纳。在

他 67 岁那年辞官，回到镇江，在定林寺出家，于第二年逝世。如果刘勰不出去当官，继续写他的第二部、第三部《文心雕龙》，那么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将更丰富。

（二）刘勰《文心雕龙》成书原因

据清代学者纪晓岚考证，刘勰在齐代末年完成了《文心雕龙》的写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能够得以成书，我们认为有时代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刘勰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刘勰生活于宋、齐、梁时期。这三个朝代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几个朝代。宋（420—479 年），首尾凡 60 年；齐（479—502 年），首尾凡 23 年；梁（502—557 年），首尾凡 56 年。其时，中国在黄河流域是北朝，由十几个少数民族占领。长江流域建立的是南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称为“六朝”。少数民族经常南侵，同时皇朝迭兴，政局多变，战争频仍，内乱不止，统治残酷，人民流离失所，或惨遭随意杀戮。那些统治者忙着夺权，对于士人的言论作为，只要不妨碍他们的统治，不对他们说三道四，一时也不多限制，这就给士人以思想活跃留下了空间。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写作，也是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相对活跃的情况和文学的发展相联系的。这里我想指出四点：

第一点，思想活跃的社会环境

自东汉以来，“独尊儒术”已不可能，这主要是经过了西汉和东汉几百年的保守的统治，儒家的伦理规范已成为教条，既然是教条就没有生命力，就迟早要遭到人们的反对。特别是黄巾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打击了儒家的权威。随后是董卓之乱和曹操专权，也使儒学声名扫地。像曹操专权后，“他立法是很严的……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曹操）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3] (pp35—36)} 在知识界，对于儒家学说开始怀疑。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名士”，他们敢于批评当时的政治，成为当时政府的反对派，政府就说他们是“党人”，把他们禁锢起来。这就

是东汉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尽管有党锢之祸，还是有人要冲破名教和礼法，说一些违反儒家伦理的话，如曹操要杀孔融，叫一个名叫路粹的人揭发孔融的罪行，路粹就揭发说：孔融曾讲过，父亲对儿子有什么亲？实际上当初不过是发泄性欲而已；儿子对母亲有什么亲？比如一个东西寄在一个瓶子中，当那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就与瓶子脱离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当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见《后汉书·孔融传》）。孔融说的话不一定对，但它是反儒家名理的。曹操借儒家的孝道杀孔融，也并不表明曹操对于儒家的教化有多么的崇奉，他自己的不少诗文与儒学无关，甚至是直接违背儒学的。例如大家都知道曹操的《选举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些“令”的核心就是取士不废偏短，唯才是问。因为曹操一生讲的就是“以权术相驭”，并不拿儒家思想当一回事。曹魏时期“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嵇康，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直接讲出了反儒的思想。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东汉末年以来，儒家伦理教条的没落，人们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欲望，发现了情感，发现了个性等，思想解放日益趋于活跃，各种思想的竞争，是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的。这一意识形态方面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刘勰生活的宋、齐、梁。这种多元并存和竞争的局面不能不影响刘勰，不能不影响他的《文心雕龙》的撰写。刘勰对儒家的经典既有遵循和学习的一面，又有补充和发挥的一面，对当时流行的“新声”也有所批评又有所肯定。他的《文心雕龙》既是对前代文论的总结，又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文学实践的理论概括。

第二点，谈玄之风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以“名士”为核心所创立的一种哲学形态，它崇尚超乎形质与经验的玄远，以老庄学说和佛学中的一些命题为谈资，用清谈的抽象的方式，着重谈论的问题有“有无之辩”、“名实之辩”、“才性之辩”和“言意之辩”等。玄学的兴起与上述“党锢之祸”有关，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于是士人对政治生活淡漠，明哲保身，转向清谈，这也是“隐”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话，那么以王弼和何晏为代表的另一些士人就归隐于玄谈。另外，门阀制度的兴起与巩固，大地主贵族养士之风日盛，也为清谈的玄学提供了基础。玄学具有对儒家正统观念解构的作用，可以说粉碎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和“天不

变道亦不变”的儒家理论基础，使人的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因为玄学将世界上任何事物，大至天地宇宙，小至花鸟鱼虫，都作为玄思的对象加以把握，从而大大突破了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精神的狭小天地，实质上是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在玄思中，人们可以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忘记尘世的烦恼，进入一个自由的审美境界，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觉去面对世界的有与无、名与实、才与性、言与意、形与神、俗与雅、乱与治、功与罪、好与坏、美和丑、入世与出世等，并根据自己的感觉和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在当时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玄学的兴起和佛学的引进相互推波助澜，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文论的发展是特别有益的。这主要是为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社会思想的氛围。刘勰的《文心雕龙》本身不是玄学，更非佛学，但谈玄信佛的氛围为《文心雕龙》等文论著作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多元思想并存的良好环境。作者可以在谈玄之风的影响下，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具体的考察，展开自己的独特思考。

第三点，“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发展带来生机

魏晋时期，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刚健的建安风骨出现，文学被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同时，又有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的观点。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创作个性得到承认。其后，宋明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别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学也独立为一部。同时，史书也开始立文苑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齐以来的文、笔区分，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云：

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凡谓之笔。

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之分，在当时成为一种通论，这对文学来说是很大的事情。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把文笔的区分等同于现今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

但文笔的区分推动着文学从此前的依附状态中“独立”出来，它标志着“文学的自觉”（鲁迅语）时代的到来。后来昭明《文选》中的选文就以诗赋为主，不选经书，不选诸子，不选史传。文学的自觉给文论带来了生机。“文学的自觉”实际上有深刻的历史内容，在魏晋六朝以前，中国的文论实际上是儒家的教化理论的附庸，道德论是文论中的主导内容，个人的审美的自由所占的地位较少，到了魏晋六朝，随着儒家经典的衰落，文学和文论都出现了一个转折，即从儒家教化论到审美论的转折，主要的标志有两点：一是重视个性的情感的表现，所谓“文以气为主”（曹丕），所谓“诗缘情而绮靡”（陆机）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说法，这种说法大大超越了“诗言志”和“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的“美刺”的功利文学理论；二是重视作品的形式美，所谓“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萧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说法。《文心雕龙·序志》提出“剖情析采，笼圈条贯”，强调“物以情观”，强调“情者文之经”，强调“情”与“采”的关系，就是大体上沿着“文学的自觉”的道路前进的。可见“文学的自觉”给文论著作的产生带来了推动力和必要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第四点，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引起了刘勰的思考

任何时代的文论都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密切相关。刘勰生活的时期离魏晋不远，齐、梁两代则是他生活的时期。因此，刘勰对魏晋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怎么评价，直接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取向。换句话说，刘勰正是对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有思考有看法，心中蓄积了不满，这才使他的《文心雕龙》成为不得不说的话，有现实针对性的话，有时代特征的话。

那么，他对于魏晋以来文学是怎么看的呢？《文心雕龙》一书涉及的作品种类很多，我这里主要阐述刘勰对魏晋以来诗歌作品的评价。曹魏时期的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变化，因为它摆脱了汉代以来章句之学的繁琐解释，诗人们对于自己的情感、欲望、追求和理想有了自觉，思想大为解放。刘勰对于建安文学是大加肯定的。《明诗》篇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

也。”意思是，到了建安初期，五言诗蓬勃涌现出来，魏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在文学的道路上纵马奔驰而有节制，王粲、徐幹、应玚、刘桢望着前路争先赶上去。这都是爱赏风月，游玩池苑，叙述恩遇和荣宠，写出酣乐的宴会，慷慨地逞气势，激越地骋才力。书写情怀，陈说事理，不求纤密细巧，运用文辞，描摹形貌，只求显著鲜明，这是一致的。刘勰对于建安文学的评价，从题材上面，指出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从文风上肯定其“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这个评价揭示建安文学内容可取，特别是文体上有风骨，说明刘勰赞赏有加。但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段话里不是没有问题：第一，没有提到曹操，没有提到他的诗，这是一个有意的遗漏吗？第二，曹操、曹植最值得肯定的描写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的诗篇，如曹操的《薤露》、《蒿里》、《步出夏门行》和曹植的《送应氏》这样社会内容深刻的作品，都未提到。这说明刘勰的文学观念中比较看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艺术表达的健康而有文采的声色和藻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可能就是刘勰的一种审美理想。

晋代谈玄之风盛行，这对文学有何影响呢？刘勰《明诗》篇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意思是，晋代的许多作家，稍稍流于轻浮绮丽。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这些诗人在诗坛上不相上下，文采比正始作品繁富，可艺术力量比建安作品柔弱。有的剖析辞藻以为精妙，有的追求音节以为流美，这是大概的情况。东晋的创作，陷在清谈风气里，讥笑致力政事的志趣，极力推崇忘却世情的空谈。袁宏、孙绰以下，虽然各人都有些雕饰文采，可是志趣一致，没有谁能够跟他们争为雄长，所以郭璞的《游仙》诗，辞义挺拔成为杰出之作了。看得出来，刘勰对西晋和东晋的文学发展不满意，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充满空谈，“平典似道德论”，而文风上面美是美了，却比建安文学要纤弱无力。

宋代是刘勰生活的时代，但怎么来看宋代的文学发展呢？在《时序》篇，刘勰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

龙章，颜谢重叶以风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箴，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於天衢，驾骐驎於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这些话显然是场面上的话，因为是要议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不能不违心地说一些套话、歌功颂德的话。但在《明诗》和《物色》篇就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评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又《物色》篇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这些评语较为客观，从中可以看出：第一，他对“繁采寡情”的“庄老告退”（即玄言诗衰落）而山水诗兴起是肯定的，认为这是文学的积极的变化。第二，他对“文贵形似”也不是十分不满，认为“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写得具体是好的。第三，他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似带有不满之意。因为他的主张一直都是“文质相称”、“述志为本”、“为情而造文”，对于一味玩弄字句和技巧的文章不甚满意。像对谢灵运的“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白云抱幽石，绿筱媚青涟”（《过始宁墅》），“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这些受后人欣赏的句子，可能认为“文”有余而“质”不足。

总之，用他在《序志》篇的话说，近代文学，“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创作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他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以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理论建构。

第五点，此前文论著作的局限促使刘勰产生超越前人的写作冲动

还有一点，他之所以写《文心雕龙》一书，是他看到虽然此前论文论的著作不少，如有曹丕的《典论》，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但都局限于某一点某一方面，格局很小，很少有宏大的思考，“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以他当时的准备是能够超越前贤的著作的。那么，刘